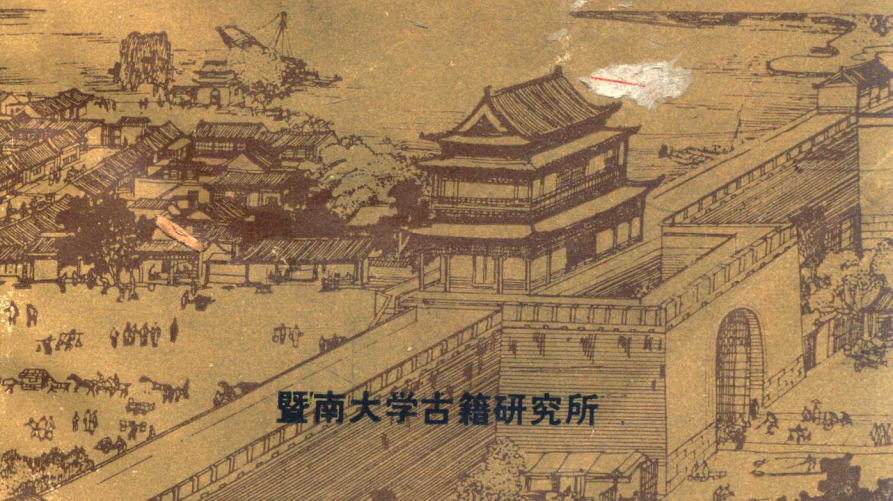


# 宋元明清文化史研究

## 论文提要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 宋元明清文化史研究

(论文提要)

STUDIE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S)

庆祝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年献礼

TO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JINAN UNIVERSITY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中国 广州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前 言

我国有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这一文化遗产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同时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学术界同志从各个方面共同努力，继续探索研究。我所是以原宋史研究室为基础建成不久的机构，所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化史及与之有关的历史文献。建所一年多以来，经过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都有一定收获和心得。现将同志们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成文集，初步定名为《宋元明清文化史研究》，并已取得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为庆祝我校建校八十周年，特先编出该文集《提要》，作为庆祝校庆献礼。并附我所情况简介及所内人员部分译著目录供参考。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 论 文 提 要

论 文 提 要

本论文主要研究了……

……

# 目 次

## 前言

### 论文提要:

南宋的反道学斗争……………暨南大学顾问 王 越 (1)

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

及其历史意义……………陈乐素 (3)

刘恕与《通鉴》……………陈乐素 (6)

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浅谈时君好尚、

举士措施及党争党禁的影响……………常绍温 (7)

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与豪放风格……………陈应潮 (8)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汤开建 (10)

元明杨家将杂剧考略……………杨芷华 (12)

《海国图志》卷十一校释……………陈 华 (14)

《四洲志·暹罗篇》校释……………陈 华 (15)

五代宋初禁军之发展 (译文)……………

〔日本〕堀敏一撰 张其凡译 (17)

### 附录:

本所简介…………… (21)

本所成员…………… (22)

本所成员部份译著目录…………… (23)

# 南宋的反道学斗争

王 越

朱熹（公元1130—1200）是南宋时代一个著名的道学家和官吏。自南宋末年，历元明清几个封建王朝，为时约七百年，封建统治者对朱推崇备至；他的著作深化三纲五常的理论，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我们要对他进行评价，就必须首先考察他在政治、学术、“制行”，以及言教身教方面的种种表现。南宋反道学的斗争有助于我们对朱熹的了解。

南宋朝廷面临两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一是如何应付金源贵族继续南侵；二是如何应付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南宋君臣一致认为后者是心腹之患，必须加以镇压。朱熹居官时，在这方面是从不手软的。至于对金的和战问题，宋朝廷中大致分为三派：一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一是以岳飞、虞允文等为代表的抗战派；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观潮派。朱熹之主和、主守、主战以至缄口不言抗战，只强调扑灭农民起义军的迫切性等等，大抵是窥测最高统治者的意旨而故意迎合，从而表现其政治立场的投机性和虚伪性。

朱熹在学术方面，继承北宋的周敦颐、程颢及程颐，援道入儒，援佛入儒，而构成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在治学态度方面亦表现一定程度的虚伪性。例如他极端推崇

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认为此乃周氏的自创，而讳其源出于道教的《参同契》；甚至擅删此书的附图，以掩其迹。作伪心劳日拙，可见一斑。又如朱熹说，“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源。……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明明是朱熹自己袭取释氏之说，却诡称对方与己说雷同。如此虚伪，岂不令人齿冷。

在“制行”方面，朱熹可议之处甚多。如自己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即不仅霸占亡友的财产而且霸占其出家之女为妾。他平日所标榜的“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货、色二字，必须勘破”等等，都抛到东洋大海去了。他的种种恶行撕下了作为一代大儒的伪面具，为公论所不容。其他如迷信风水，谋取某文庙之地为“吉穴”，与其崇圣尊孔之口头禅，极端矛盾，大受时人攻击，亦属咎由自取。

朱熹长期从事教育，弟子众多；从卷帙浩繁的《朱子语类》以及《朱子大全》看来，他对弟子耳提面命以及函授指示之多，诚属空前。但临死时，自叹无人可接受衣钵。王夫之亦指出朱氏死后，门风不振。考其原因，大约有三：朱熹的传道，其道不广，自限门户。弟子稍自负者往往中道离去。此其一。朱氏门户之见甚深，以排斥异端为标榜，但他自己对释道二家，是阳抑而阴用之；议论释、道，又往往前后自相矛盾，自难取信于人，亦难取信于弟子。此其二。朱氏言行不一，虽道貌岸然，但只是言教，而身教方面，难起模范作用，黄干所作朱熹《行状》，多溢美之辞。这样的“宗师”，何能使及门弟子卓然有所建树？此其三。

《宋史》朱熹本传的作者多方掩饰其短；但朱熹作伪之迹，彰彰可考；其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忝为儒家宗匠之种

种劣迹，即朱熹本人亦惭愧承认。林栗、胡紘、沈继祖、高文虎等予以揭露，贬之为伪学，道出了朱熹治学和“制行”虚伪的一面。朱熹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但他的学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为害甚大。本文揭出这个道学家的虚伪性，也许有助于肃清封建意识形态的流毒。

## 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 及其历史意义

陈乐素

本文在序言之后，分七节论述：一、经史的校印颁行；二、佛经的翻译和雕印；三、《道藏》；四、四大书的编纂；五、医书；六、古籍整理与政治；七、校勘与校勘学。

北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中一个文化新发展时期，而当时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宋立国一百六十多年，前期与契丹对立，中期，即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建立之后，宋、辽、夏三国并立，宋对外便更加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主观上努力谋求国内局面安定，是北宋政府的一贯政策。

北宋早期收集了大量的典籍和资料，设专门机构，选专职儒官多年反复从事整理；特设传法院，迎高僧与梵学僧从事佛经的翻译；又屡度专事道书的搜求编校；并特别选出重

要的经史文籍、医书及部分子书，由高级官员与通儒专事编校，利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印刷术大量印行，使许多古籍能够保存下来。其中有儒家经史和文字学、音韵学等专著，有最早的印本佛教经典《开宝藏》，最早的印本道教经典《政和万寿道藏》，有传统的名医专著等等。这无疑是有功于历史文化事业的。

先说太祖建国，在五代纷乱之后，收诸将兵权，平荆南、后蜀、南汉、江南，连年用兵；对内则采取安定人心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儒家思想教育，继续印行后周已雕成的九经，并继续尚未完成的《经典释文》校印工作，以便于士子学习，增加士子的数量，增强儒学的统治力量。与此同时，改变后周的排佛措施，保护佛教，适应民间的宗教信仰；又按唐《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创印佛藏《开宝藏》，礼遇印度东来的高僧，翻译佛经。此外，还选医官详校定印行《本草》以便民。

太宗初年完成统一后，虽曾接连有高梁河、歧沟关、陈家谷之败，但仍坚持文治政策。太平兴国二年（977）即创建崇文院，集中得自诸国图书，招各地文士，编校古籍，成《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校印经义、字书、韵书；校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便于士子学习，应科举考试；又颁行医书《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等。另一方面，兴建译经院（后改名传法院），迎天竺三藏法天、天息灾等居院中翻译新经印行。又特命儒撰《三教圣贤录》以示不排斥道教，并设专官雠校道书。

真宗初年，命官续定史书《三国志》、《晋书》、《唐书》及诸经疏，又自撰《圣教序》，意在粉饰太平。但景德

元年（1004），契丹大举入侵，导致翌年澶渊耻辱之盟，送予契丹大量银帛，平添人民负担。真宗不图雪耻，却与王钦若等君臣合谋，作政治欺骗，伪造“天书”，造成极坏影响，滋长因循苟且风气。他命王钦若所编道书，中多舛误，经张君房等重集各地道书，改编成《天宫宝藏》。张君房又摄要成《云笈七签》。道书中多虚构伪作，但在修养，保健、卫生、体育等诸方面的叙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可与古医书结合研究。道书之外，对古籍整理，还有重修韵书与字书工作，并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成《册府元龟》一千卷。

仁宗以“天书”殉葬真宗永定陵，实际表示了对天书事件的否定。他着意改变颓风，改革科举制，但为时短暂，即被守旧势力所压倒。仁宗时期，还大校史书《南史》、《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等，完成当时全部正史的校印工作。对佛经的翻译，新成八十五卷，基本上结束北宋的译经事业，当时又特设校正医书局，校印了大量医书、医方，对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英宗时期短暂，神宗与王安石君臣合力进行政治上大改革，来不及对古籍多作整理工作。

哲宗以至徽宗前期，发生了政治上激烈的党派斗争。崇宁时出现徽宗亲撰的《元祐党人碑》，排斥、压迫元祐诸臣，禁止印行他们的作品。崇宁、政和间，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诏设经局，求道经，集道士修校，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名《政和万寿道藏》。徽宗的目的在于自己作为一个“教主道君皇帝”，应有教的大经典，因而滥增卷数。这在道教中人，亦认为并不纯正。但这毕竟是最早的《道藏》印本。徽

宗是一个在经济上严重剥削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在政治上招致亡国的皇帝，但在个人的兴趣上，颇重视书、画、医学，而设教于学校。

北宋一百多年，长期从儒、佛、道、医等古籍整理印行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留下大量文化遗产，有功于历史；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但迟迟未能作出总结。作为历史发展进程，自然会产生校勘学的要求。于是有郑樵的《校雠略》，作为第一部校勘学专著出现，为南宋以后的校勘学开辟了道路。

## 刘恕与《通鉴》

陈乐素

本文概述了司马光邀请刘恕参加编写《资治通鉴》的原因及经过。对刘恕参与《通鉴》写作的严肃态度以及刘恕的著作成果，作了简要的介绍评价，并对刘恕的生平及其思想、性格和行为等方面，作了概略的考察。对刘恕作自我批评的“二十失”和“十八蔽”，则以专节加以述评，从中可以略见我国古代学者律己之严，治学之谨；对后代学者之做人治学，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 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

——浅谈时君好尚、举士措施及

党争党禁的影响

(宋代文化史研究之一)

常绍温

宋代着重“文治”，重文轻武的国策削弱了国家的防御力量，文化学术方面却有很大的发展，诗是其中之一。宋诗在我国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阶段，它在唐诗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前人往往以唐诗为典型来论列、评价宋诗，有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者，亦有谓元诗超过宋诗者。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这些意见多是就诗的艺术风格而言。唐诗、宋诗各有特色，本文不拟对作品本身作论述。在上述前人的评价中已可说明：宋诗继唐诗之后，对后世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诗，作为上层建筑艺术形式之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过去，人们往往多从三个方面论述宋诗的发展：一、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所产生的影响；二、认为诗发展到唐代，已臻于登峰造极的境地，宋人欲翻陈出新，创造出能媲美唐人甚至超过唐人的成果，只有另觅蹊径；三、强调作家个人所受诗文传统的影响

和个人在这方面的艺术爱好。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还有另一方面因素也值得重视，即政治对于宋诗发展的影响问题。

同时，在封建社会中，君主作为最高统治者，其政治意图和个人好尚，对于国家各项措施的制定和施行，无疑有着巨大影响。而一种文化风尚的盛行，必然会影响到社会风气，特别是影响到知识分子阶层的习尚。由于宋代臣僚多从进士出身，士大夫的习尚如何，就不仅是个人的好恶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政治。因此，诗文风尚、士风士习与国家政治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北宋时期，政治上进行的一系列政争，包括诗文革新问题上的斗争，很多都牵涉到士风士习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试就上述诸问题的几个方面——诸如北宋政府扩大取士来源的原因和情况、君主的政治意图和个人好尚、诗赋取士问题上的争议、朝廷的党争党禁等等，对于宋诗和当时的士风士习发生的影响，略作探讨；并对社会风气一旦形成，要想变革之不易及其复杂性，就本文所及的问题，试作历史的考察。

## 李清照词的婉约风格与豪放风格

陈应潮

李清照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历来以婉约名家，前人曾誉之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然而，对清照词的艺术风格仅仅用

“婉约”二字是远不足以概其全貌的。本文试根据清照现存的词作及其生平事迹，对她的艺术风格和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作一个粗浅的探讨。

清照词上承李煜，具有明白晓畅、不事雕饰、自然真率、浓烈感人的特点，但较之后主词要冲淡轻灵、含蓄委婉；兼有秦观清丽蕴藉、“情韵兼胜”的长处，而比秦词更具刚健之气。清照还善于以淡语写深情，善于“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她的别具慧心的创造，使婉约词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峰。

在清照的集子中还有一部分风格豪放、意境沉郁的词作，标志了她的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例如《渔家傲》（“天接云涛”），《鹧鸪天》（“暗淡轻黄”）等，表现了她自信自强的豪迈气概，《蝶恋花》（“永夜恹恹”）、《永遇乐》（“落日熔金”）等词，抒写了她对家国沦亡的满腔悲痛和忧时伤世的爱国感情。她是宋代较早用词来表达爱国感情的一位作家，对辛弃疾、刘辰翁等爱国词人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总之，李清照的词不仅有婉约风格的，也有豪放风格的。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是以婉约为主，但细加分析，可以看出豪放更能体现她这个人的思想和性格。可以说，她的词是在婉约中见豪放，在豪放中见本色，形成她的独特风格的原因主要是生活经历、时代背景的影响，文学传统的影响和她本人思想性格的影响，而这几方面的影响是互有交叉、互相渗透的。

# 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

汤开建

本文拟分四个阶段来论述亡国以后的西夏遗民在蒙元王朝的政治地位。

第一阶段可断在元王朝建立以前，即蒙古国时期。这一时期经历了铁木真（太祖）、窝阔台（太宗）、贵由（定宗）、蒙哥（宪宗）四位蒙古大汗的统治，他们在对待西夏遗民的态度上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说来，西夏遗民在蒙古国时期政治地位是不高的，如与同时期的回回、畏吾、吐蕃诸族相比，其地位更是相形见绌，就是与当时降蒙的金国旧臣相比，西夏人所处的地位也远不如金臣之地位重要。四汗时期，除了一位早在西夏亡国以前就被成吉思汗养为义子的西夏人察罕进入了蒙古国上层统治圈外，其余的西夏遗民或遭蒙古军屠戮，或作一般降人处置，命运好者，亦不过“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

第二阶段为忽必烈（世祖）及铁穆耳（成宗）统治时期，即元前期。这一时期，元王朝对西夏遗民的政策有明显改变，首先是将西夏遗民纳入到元朝四等阶级的第二等级的色目一类，从法律上确定西夏人为元王朝中地位仅次于蒙古的统治民族，在政治上享受同回回、畏吾、吐蕃等其他色目种类一样平等的待遇，较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及北方汉族）、南人（指南宋人）之地位高一、二等。同时，在实际使用中，蒙古统治者在各个领域大量破格提拔西夏遗民，使他们进入各级领导阶层。特别在军事上对西夏遗民更加倚

重，出现了一批象李恒、塔出、爱鲁、来阿八赤、昂吉儿这样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西夏族军事将领，在世祖后期及成宗时，西夏人暗伯与阿乞刺父子竟先后担任了掌管元朝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长官——知枢密院事。这可反映，在元前期，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较蒙古国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抹掉了亡国民族的耻辱，而以一个统治民族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

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使西夏人史氏一家勃兴，而史氏一家的兴衰又几乎与元朝中期相始终，即武宗、仁宗、英宗、泰定、文宗在位之时，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西夏遗民政治势力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中，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时险时夷、跌宕起伏。武宗即位时，由于史家乞台普济父子与海山汗（武宗）的特殊关系，出现了武宗朝西夏人势力猛然膨胀之状况；乞台普济，十九月中，九次降制；史氏家族，一门之间，三为丞相；父祖追赠，子孙庇荫，权势之重，为一时之极。仁宗即位，一改武宗旧政，曾倍受武宗恩宠的史氏一家失势，免位罢官者均有，乞台普济之子哩日因反仁宗兵败，不知所终，英宗一仍其旧。直到文宗时，又启用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也儿吉尼从云南召回，又担任了知枢密院事的要职，并拜太尉。这说明，西夏人的政治势力在文宗朝又有所回升。

第四阶段即元后期的顺帝在位之时。从总的趋势看，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势力是越到后期势力越大，政治地位也是越到后期地位越高，主要表现是西夏人在元朝政府中任职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元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由于元朝政府实行的各种优待色目人的制度，具有较高封建文化水准的西夏子弟在色目诸种人中自然占有竞争优势，他们通过

科举、受荫、宿卫各种途径，大批进入仕途，而逐渐上升为上层统治者。元顺帝时，南方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西夏之儒臣大都习武，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因此，元王朝大量起用西夏遗民，让他们充当镇压南方人民起义的刽子手，这些西夏遗民也因此而被推上了元朝上层统治阶层，在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军队、监察等机构中把握权柄，亦怜真班、高纳麟、沙览答里为显赫一时的重臣，余阙、星吉、永年，三旦八则为“彪炳青史”之烈士，一时西夏人物之繁盛，足以反映西夏遗民的政治地位在元顺帝时已上升到最高峰。

## 元明杨家将杂剧考略

### ——《杨家将论丛》之四

杨芷华

全文三万字，引用《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等四十一一种书的资料，对元明杨家将杂剧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探考：

- 一、元明杨家将杂剧的渊源；
- 二、从《元曲选》两种杨家将杂剧说起；
- 三、《孤本元明杂剧》四种杨家将杂剧；
- 四、三个存疑剧目的探讨。

文中论述的重点为：

- 一、讲述杨家将的宋话本，除《杨令公》、《五郎为